

2021 年外交部台灣獎助金外國學人結案報告

計畫題目：文化冷戰與新聞傳播教育機制—1950-60 年代台灣
新聞傳播教育的跨域實踐與影響

The Cultural Cold War and Journalism Education

Mechanism : The Transboundary Practice and Impact of

Taiwan's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1950-60's

報告人：黃國富 WONG KOCK HOO（馬來西亞）

日期：2022 年 3 月 1 日

摘要

1954 年後蔣介石因應內外的各種壓力，在季風亞洲地緣政治中順勢接收更多美援，在台灣強化大學教育建設和建立在台灣的宣傳機制。此時國府透過招收大量東南亞「僑生」，增強對大學體制的控制力，也以此強化其內外的「自由中國」正當性，以及培養在各地宣揚自由民主意識。前身為黨校的政大在台復辦與其新聞系招收近半的「僑生」，成為當時相當特殊大學與科系，而台灣新聞傳播研究與教育以政大新聞所系為重心的開展，除了蔣介石與國府的治理需求，當中也考量美國與亞洲非共國家的反共策略與佈局，也涉及各國對在地華人的政策回應和治理。

政大新聞系復辦後的主要主事者與黨政關係緊密，且在形式上以「密蘇里模式」為主的新聞理念為基礎，但還是須符合國家安全與「反共復國」的特殊現實需求，難以挑戰以「國家」之名舞動權力的領導人權威。但是在「國家」內部的利益分配等因素，連動影響政策的推動，且仍有被壓制的些許異議聲音。國民黨政權重整宣傳指揮體系和取得更多美援下，在季風亞洲試圖建立「自由世界」之窗的形象，在相當程度上形塑冷戰初期的台灣傳播研究與教育機制初步基礎。



壹、前言

華人在「季風亞洲」(Monsoon Asia)之間移動和活動，已有很長遠的歷史，在近現代的海外移民中有如 Kuhn (2008) 所稱的「通道」(corridors)，即一條使移民與故鄉維持有意義聯繫的通道，某一程度上也使華人從未真正離開過故鄉。在辛亥革命以前，流離海外的華人也未對自己的身分做特別界定(麥留芳，1985，頁 32)，但是中華民國建立前後，到二戰後的國共內戰和冷戰期間，這些華人卻成為各方爭取的對象，而建構中的「中國」民族國家概念，也逐漸影響各地華人的政治認同，這些生活在「季風亞洲」不同地域的眾多華人，持續與「中國」及寓居地的互動，對彼此社會和政府產生直接或間接的相互影響。

1949 年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由中國大陸撤退遷台後，風雨飄搖，不論是因應動員戡亂地總動員狀態，或是戒嚴下的軍管措施，在體制上台灣處於戰爭狀態，並以此為基礎推展各種政策，為即將到來的戰役做準備，因此，戰爭與內政治理兩者的緊密關係，成為台灣 1950 年代的重要特色(林果顯，2015，頁 241-242)。同時在外部環境下，面對國際冷戰狀態越趨對峙與緊繃，國府除了要鞏固在台灣政權，也面臨季風亞洲地緣政治的複雜連動關係和動態趨力變化，當中有多個力量的交錯牽制，未必為美國政府與在台灣的國府掌權者所能完全掌控。

1950 至 1953 年冷戰初始的韓戰爆發，讓國民黨政府獲得喘息空間，稍穩定陣腳與反省挫敗經驗。1950 年後的十五年間，在台灣出現以新設或復校的方式，陸續成立了 6 所公立大學和學院，以及 12 所的私立大學和學院，加上原有的 3 所改名與改制大學，總校數增加量相當明顯(黃金麟，2017，頁 127)。在這樣戰時緊繃的時刻，國民黨政府具備了什麼樣的內外條件和需求，在台灣啟動大學的發展？前身為黨校的政治大學在 1954 年成為首個復辦大學後，首開辦 4 個研究所中，新聞研究所是其一；隔年再開辦大學部的新聞系，且招收的學生中，為何近半是各地華裔青年／「僑生」¹？

在有關台灣傳播教育與研究機制建構初期的先行研究和討論中，主要把焦點放在在國府的威權統治下，在以「反攻復國」之名下，將傳播媒體與學術視為宣傳武器(林麗雲，2004)；或認為在國際冷戰的政經脈絡下，美國積極地向其他國家輸出美國的傳播學術與意識形態，譬如透過「美援」協助台灣建構傳播教育機制(程宗明，1999)。因此，針對此議題的研究，主要台灣新聞傳播教育與研究機制建構初期的研究和討論，主要從台灣威權體制和台灣附屬於美國的權力視角出發，從教學資源、主事者人員背景和課程等，剖析體制的構建和批判其早期威權性格。

¹「僑生」的稱謂有其歷史脈絡與爭議，在中華民國的血統主義下，早期暫時寓居／僑居的華裔子弟抵台念書後，大致仍視其為回歸「祖國」者，但隨著各地華裔的居住地陸續取得國家獨立，獲當地國籍者已不適宜稱為「僑生」，但在錯綜複雜且糾結的歷史因素和現實政治中，迄今台灣仍使用這樣的稱謂，持續引起一些外國華裔學生的抗議。

然而這些研究可能受限於早年檔案開放不足等因素，未必關照到台灣所處的「季風亞洲」，在冷戰初期整體環境快速的變動與其複雜性，其中包括不同力量的競逐與碰撞，像是「國家」（the state）內部權力的可能分歧與第三勢力對蔣介石政權的挑戰，以及外部的美國要阻止紅色力量在東南亞擴散與各地華人社群對大學的渴求等，涉及的除美、台之外，還有和亞洲（特別是華人）之間的連動關係，這些因素都影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策略及國民黨政府在台灣構建高等教育機制。為何在政大新聞系有眾多「僑生」，所以也需同時檢視美援與僑務政策的形成和實施，可以看到更複雜的脈絡，其中牽涉更多面向的權力操作和偶然因素，且未必是由上而下單一連貫的運作，也成為美援時期新聞教育不可忽視的部分，連動影響了新聞教育與研究機制的構建。

本文嘗試梳理和認識文化冷戰初期的脈絡複雜性，從季風亞洲之間的連動關係，重探冷戰時期反共氛圍下，在美國戰略需要下介入的台灣傳播研究機制建構，以及它對台灣內部和亞洲跨域地區的可能影響，透過多面向貼近當時脈絡，更了解台灣新聞傳播研究教育機構建構初期的狀態。

貳、文化冷戰下的台灣外部環境變化

在冷戰的衝突與對抗情勢下，1950年代以後美國得以直接介入更大範圍的季風亞洲地緣政治，全面擴張其在政治、軍事、經濟及文化的影響力，將西方的自由民主意識形態更廣泛地散播，避免共產力量的擴張。將政權撤退到台灣的國民黨，歷經風雨飄搖，在韓戰爆發後逐漸被扶植成為華人「自由世界」代表，獲得更多美國資源的挹注，以爭取不同地區華人的支持與認同「自由中國」（Free China），有利於蔣介石經營與鞏固在台灣的政權。

一、型塑「自由中國」的驅力

面對共產勢力在亞洲各地的進逼，領導西方民主集團的美國政府，在1950年代開始擔心東南亞各國頗有經濟力量的華人社群，會被中共引用為在東南亞擴張勢力的工具。因此，美國希望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能成為「自由世界」的象徵，導引東南亞華人以台灣政府為期效忠的對象，讓「自由中國」成為各地華人團結反共的集結點（rallying point）（趙綺娜，1995）。

然而，此時美國政府對蔣介石與國民黨仍不信任，不斷物色與扶植可能取代蔣介石的領導人和力量，當中包括孫立人、吳國楨，以及反共也反蔣的「第三勢力」等。

同時美國政府也不滿蔣經國當時主持的國安系統，在台灣各處逮捕異議人士，進行白色恐怖活動等與民主精神背道而馳的相關訊息（林孝庭，2015，頁 98-99）。

因此，此時蔣介石在台灣的地位仍未完全穩固，其權力地位可能為其他美方所支持的人選所取代，蔣介石把政治現實考量擺在第一位，鞏固在台領導地位與權力基礎，成了其首要之務。1952 年 11 月，向來較同情蔣介石的美國共和黨，在間隔十二年後，由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搭配尼克森（Richard Nixon）當選總統，重奪執政權，此一情勢發展有利於蔣介石政權向美方爭取支持（林孝庭，2017）。韓戰展開的三年間，外在緊繃情勢持續變動著，讓蔣介石政權暫穩住陣腳，同時警覺美國態度的可能轉換，以及提防和打擊可能的競爭對手。

韓戰的停火談判拖了兩年才達成協議，讓美國政府對中共的耐心被冗長的談判消耗殆盡；加上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已確定蘇聯不會以武力介入韓戰，也無意發動世界大戰，所以對中共態度漸趨強硬，將注意力轉向防止共黨向東南亞地區的擴張，並強調亞洲離島防線的重要性。雖然台灣國民黨政府作為軍事資產的價值似乎有限，但在 1952 年春天之後，其做為政治資產的價值在華府決策者心目中卻大幅提升。對台灣經濟和軍事潛力樂觀的報告，加上台灣政治局勢改善，改變了國府的形象。另一方面，美國想培植另一個中國政權吸引華僑的支持，以避免中共顛覆東南亞各國。但美國始終無法培養出可利用的「第三勢力」，蔣介石也逐漸成為大陸反共運動的象徵，且在華人反共集團中實力最強，所以美國確定無法擺脫蔣後，決定將他塑造成中國人的反共領袖，號招海外反共華僑，台灣因此也被賦予政治利用價值（張淑雅，2011）。

此時的蔣介石也積極爭取美國的各種支援，重新建立在台灣的權力基礎。在 1950-65 年期間，台灣的外部戰爭狀態仍緊繃，雖然蔣介石政府很需要美國，但是在亞洲冷戰場域中的蔣介石，絕非僅只扮演著由美國所領導之「自由世界」陣營裡，一個凡事仰仗美國鼻息、以華府馬首是瞻、唯華府是從的馬前卒。相反地，國民黨政府為了台灣自身的戰略生存與安全利益考量，在中南半島與其他東南亞地區，曾廣泛而積極地介入各地的軍事衝突，設法輸出自身的反共經驗與意識形態，以確保並強化其在國際地位與台灣內部統治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林孝庭，2015，頁 13）。

林孝庭（2017，頁 266-267）指出，蔣介石在 1950 年代初期所推動的黨務改造，以及其試圖深化國民黨在台灣社會基礎的種種作為和建設，強化和鞏固了國民黨在台灣的政治地位，也加速中華民國體制在台灣形塑和深化的步伐，但是蔣介石所推動的改革舉措，部分來自於與海外敵對政治勢力（如「第三勢力」）暗中較勁的心態，甚至可說是受到這些勢力的挑戰而推動。至於美國在冷戰過程思考對中共與國府的政策時，展現的是彈性與實利主義的態度，以及他們在整個過程中的學習與調適（張淑雅，2011，頁 34），因此美方政策的思考與執行也因應情勢變化調整，與蔣介石政權也維持某種程度的張力。

二、文化冷戰的開啟與高教開展的機遇

冷戰時期領導西方民主集團的美國，在反共戰略上，除了給予盟國在軍事、經濟和技術等資源，還要促進彼此的文化、社會的交流，增進彼此的了解，更重要是要說服其他國家的人民：美國的制度、文化要比共產制度優越。只有美國文化爭取到各地人民的認同，才能避免他們接受共產思想的宣傳，保持美國在「自由世界」的影響力（趙綺娜，2001，頁 81）。

1950 年美國杜魯門（Harry S. Truman）政府實施了「真實的宣傳」，意圖傳遞美國與世界的真實資訊，此時逢韓戰爆發，心戰扮演的角色受到重視。1953 年艾森豪接任總統職務後，美國政府的對外公關宣傳政策開始大幅擴張，主因是二戰期間艾森豪在指揮歐洲與北非戰線時，已非常仰賴心戰的效果，因此他任總統後也以當時經驗將公關宣傳視為「冷戰武器」，積極推動對外的宣傳政策，且這些政策也受到右派與產業界的支持（貴志俊彥、土屋由香著，林鴻亦譯，2012，頁 7-8）。

從 1950 年代初期至 1970 年代初期美國政府視自身為「自由中國」的捍衛者，以對抗共產陣營的「赤色中國」（Red China）。美國政府不僅經濟、軍事與外交上的援助，也在學術與文化交流著力，提供各種經費的協助，且引領歐美文化思潮輸入台灣與東南亞。美國透過政府與民間組織的合作，將冷戰的層面也擴及文化面向（吳翎君，2012，頁 109）。

1951 年 6 月，美方獲得菲律賓總統季里諾首肯，以馬尼拉作為訓練第三勢力的基地，開展各種業務，包括籌備一所華文大學，收容港、澳流亡青年與海外華人，作為將來第三勢力的基本幹部，且籌辦報紙銷售南洋各地，以海外華人為宣傳對象，抗衡中共吸收華裔青年的攻勢。蔣介石知悉美方的政治動作與盤算，且獲知在美方鼓動下，當時已有些第三勢力成員，自香港飛往馬尼拉，參與各項籌備工作（林孝庭，2015，頁 98；黃庭康，2016，頁 101）。蔣介石對第三勢力猜忌甚深，惟恐其未來成為爭取美國援助和爭取各地華人支持的競爭對手（趙綺娜，1997，頁 89-90），因此，美方與第三勢力合作籌辦華文大學等動作，對蔣介石形成一定壓力。

另一方面，1952 年中共也在中國大陸展開高校院系調整，讓所有私立大學公立化，其中教會所辦的大學被接收和關閉，且對外積極招收港澳及東南亞華裔青年「回國」就學，使美國、台灣和東南亞各地政府感受到壓力。直至 1955 年萬隆會議之後，中共對外招收華裔青年到中國大陸就學的動作才趨緩（黃廷康，2017）。

除了試圖以唸大學院校來爭取華裔青年的認同，1950 年代美國也在香港和東南亞資助知識人開辦刊物等舉措，積極向東南亞華人地區推廣自由民主觀念，對抗中共日益擴張的力量，其中包括與第三勢力有聯繫友聯出版社。友聯也和自由亞洲協會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CFA）、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 TAF）合作，從香港行銷書籍、期刊、畫報和雜誌等華文宣傳品至整個東南亞。自由亞洲協會和亞洲基金會強調自身的民間性質，主要是為了區別於官方組織，宣揚自身的「非官方」色彩。對後者來說，「文化」作為媒介和間接手段，具有隱蔽政治的目的²（王梅香，2020，頁 124）。

1954 年，友聯內部知識人提出「東南亞海外青年計畫」（Youth Program for Oversea in Southeast Asia），是針對中共向海外華裔青年召喚「參與祖國的建設」，為減少東南亞華裔青年前往共產中國升學，友聯知識人提出增加更多高等教育的機會，包括興建新加坡南洋大學及台灣的東海大學等（王梅香，2020，頁 136）。

雖然美國與第三勢力在菲律賓開辦華文大學的倡議未實現，但美國認為在東南亞應設立華文大學來吸納華裔青年。在左翼力量不斷壯大的馬來亞與新加坡，1953 年當地華人開始籌備在新加坡創辦南洋大學（簡稱南大），國民黨政府也非常關注此事的進展。但是馬新的英國殖民政府認為，馬來亞逐步邁向國家獨立的過程中，創辦一所華文大學不利於培養馬來亞本土意識，然而美國國務院從區域穩定的立場，在 1954 年 4 月向英國殖民部表達支持南大的創辦，其基本理由包括：應灌輸西方的「民主原則和思想」及探索反共的潛能等，希望英政府檢討對南大的反對政策。由於美國華府的介入，使得英殖民政府的南大政策出現轉變，做出部分妥協，即允許南大的成立，但仍不承認南大的學位（楊進發，2008；利亮時，2012，頁 67-68）。馬新當時華人社會左傾氛圍濃厚，在地許多華人雖認同新興國家的獨立，但也憂慮國家成立後華人在新國家的處境，特別是其文化認同能否獲得存續，南大的成立也可視為這類焦慮的部分展現³。

美國為阻止東南亞的赤化，一直在亞洲尋找可能的各種方案，包括對青年思想與意識的影響，除了各種刊物外，也深知各地華人對大學教育的渴盼，認為是削弱左翼思想和宣揚自由民主理念的有效途徑，因此也希望台灣能興辦大學，爭取更多東南亞的華裔青年到台灣留學和生活。

1953 年 11 月初，美國副總統尼克森在訪問東南亞結束後抵台訪問，也參與私立東海大學的動土典禮⁴，對東南亞情勢有實際觀察的尼克森希望國府採取更積極的行

² 1952 年，亞協致力於發展中文廣播電台，由海外華僑集資，亞協負責在菲律賓建造電台，其聽眾目標為海外華人群體，其次則是中國大陸的官員和監測員（王梅香，2020，頁 135-136）。

³ 南大在 1955 年得以創立，但一直面對政府的不友善對待，直至 1980 年南洋大學與新加坡大學合併為新加坡國立大學，1981 年新加坡政府在原南洋大學校園內設立南洋理工學院，1991 年升格為南洋理工大學。另外，南洋大學未設新聞相關科系，且費用較高於有美援支持的台灣各大學。

⁴ 國民黨掌權者並非毫無保留的歡迎西方宗教背景的院校，因過往國民黨一職認為西方教會在中國辦學是侵犯中國政府的教育主權，且不滿教會學校未配合政府向學生灌輸對黨國的認同。因此，1950 年代初期美國教會提出在台灣開辦大學時，國民黨政府的反應是保留和審慎。經冗長的談判，”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同意國府提出的多項條件，東海大學才獲准創辦（黃庭康，2017，頁 173-174）。

動，爭取東南亞華人的支持，蔣介石回應國府已有計畫隔年開辦華僑學院（沈琦，2000，頁 243）。

尼克森離台後，1953 年 11 月 20 日首次召開的中美特別委員會上，討論由中華民國教育部擬定的《僑生教育計畫實施草案》，決定了中美合作的「僑生」教育方案（國立教育資料館編，1959:56）。1954 年初成立中美華僑教育委員會，制定教育援助方案的基本政策，由行政院長任主席。隔年逐漸交僑教問題移交由中美小組委員會負責，小組成員包括教育部、僑委會、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亞洲協會、美國新聞處、美國大使館及美國安全分署等組織（國立教育資料館編，1957，頁 53）。在美援的「僑生」教育方案中，受援助的是東南亞地區華人，香港與澳門等地的「僑生」不在資助範圍內⁵。

到了 1954 年底，台灣整體經濟、財政與貨幣情勢都有明顯改善，島內大宗物資價格大致穩定，政府預算與稅收約略打平，島上大部分地區的物資出產量，來到了 1949 年政府遷台以來的新高（林孝庭，2017，頁 278）。在政治上，蔣介石所領導的政府也穩住陣腳，且透過專制力量壓制反對聲音，對外經韓戰後，也獲得美國的支持，暫減緩中共的威脅，開展各種在台灣的建設。

在這樣的背景下，蔣介石在 1954 年 5 月 20 日宣誓就職中華民國第二任總統後改組內閣，而原任國民黨秘書長的張其昀出任教育部長。張其昀在 6 月 9 日向行政院提出政大復校後，隔月即組成復辦政治大學的籌備委員會，且在同年火速成立新聞等四個研究所，隔年政大恢復設立新聞系，顯示新聞傳播機制設立的重要性與特殊地位。1955 年 3 月，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改名為台灣省立師範大學；1956 年台灣省立工學院改制為台灣省立成功大學⁶。

從上述討論可見在文化冷戰狀態下，1950 年代初期美國除輸出和產製各種文化產品，嘗試影響東南亞地區人數眾多的華人，也希望建立華文大學吸收華僑青年，避免他們到中國大陸留學和中共影響。1954 年後蔣介石順勢接收更多美援，在台灣設立和強化大學教育，在蔣政權需要和美國要求下，開始大量東南亞「僑生」。除美國政府，亞洲基金會、洛克斐勒基金會及福特基金會等民間組織也投入資源，促進美國與台灣的學術聯繫與交流，影響台灣的學術建制。在這樣的脈絡下，國內外宣傳自由民主和反共意識，成為台灣和美國政府的重要方向，而大學新聞傳播教育機制的建立，成為兩國政府重視與開展的面向有一特殊情況，其中政大新聞系招生人數中「僑生」

⁵ 1951 年僑生共 60 名，但 1954 年在美援開始支援下，至 1965 年為止，先後到台灣念書的僑生總共有 20,078 人，主要來自港澳、星馬、印尼和越南(行政院國合會編，1966，頁 1-5)。

⁶ 1954 年有教會背景的私立東吳大學是獲准復校的一所私立大學，1955 年則成立另兩所有教會背景的東海大學和中原理工學院。軍警官校也在 1950 年代大學化，1954 年成立陸軍官校與海軍官校、1960 年成立空軍官校；中央警官學校則是在 1957 年設立四年制大學部，這都與「反攻/回到大陸」的政治和軍事準備有直接關係(黃金麟，2017，頁 128-130)。

人數幾近半⁷，明顯多於一般科系，其顯現地是此時仍在戰爭狀態下，國府在台灣內外持續變動的現實與策略需求，以及「國家」黨政內部和大學的權力矛盾與資源競爭等問題，也可窺探台灣新聞傳播研究與教育機制建構初期的不同面向。

參、黨政治理的新聞教育需求與政大的復辦

中華民國政府撤退遷台後，宣傳工作被認為是丟失中國大陸的重要原因之一，國共內戰期間輿論幾乎倒向共產黨，政府作為無法被人民理解，重要友邦如美國也同情共產黨，如何在台灣澈底扭轉此種劣勢，成為相關部門的當務之急。國民黨重視重建宣傳指揮體系，整頓媒體經營，改進宣傳內容（林果顯，2014）。1950年蔣介石決心推動國民黨的內部改造，其中包括對內外的宣傳工作。

除了實務的宣傳工作，國民黨政府在1950年代初期已有意成立傳播教育與學術機構。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同年9月國府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在台北成立國防部政工幹部學校（後改為政治作戰學校），這是透過美國防衛支助（Defence Support）贈與的款項結構性地扶助。在當時美援計畫下，大眾傳播（Mass Communication）是一種反共的科技，政工幹校成立新聞組，由留美明尼蘇達大學與密蘇里大學的謝然之任新聞系系主任，學校的教育即以反共文宣的訓練為主。在心戰方面，尤以美國的教材為重要參考（程宗明，1999，頁396-401）。這也是臺灣最早的大眾傳播教育機構，除了國民黨政府對於宣傳的需求，也與美國在季風亞洲的整體戰略密切相關，特別是急於向人數眾多的各地華人宣揚民主自由的意識，更有效遏制共產勢力的擴散，但政工幹校在軍事框架下的新聞教育，未必足以擔負此項頗為龐大的任務。

1951年國民黨宣傳業務小組成立，蔣中正仍將宣傳實務委由親信處理。1954年9月3日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臨時會議決定，成立中央宣傳指導小組，「研商關於宣傳決策之指導，並為總裁所主持之宣傳會談作準備工作」。中央宣傳指導小組是蔣中正的宣傳幕僚，協助指導宣傳決策。成員網羅黨政軍宣傳機構及黨營媒體負責人共28人，包括陶希聖、曾虛白和謝然之（任育德，2009，頁229-232）。1952年改造委員會通過的「本黨當前宣傳指導（草案）」，即指出「開設學系或新聞專修科以造就新聞人才」（林麗雲，2004）。

1953年主要由實務界人士組成的「台北市編輯人協會」推動「新聞教育運動」，曾向台大提出具體建議設立新聞系，促政府同意由台灣大學成立新聞系，以培養本地的新聞人才。該會也在媒體上製造輿論，希望能成事，但最終未獲國府接納此建議。

⁷政大新聞系僑生人數在1990年後才明顯下降（馮建三編，2005），與整體社會環境變化有關，外界對僑生政策有很大批評和壓力，傳統對外宣傳等元素也弱化。

國府本有意在大學開設新聞科系培養新聞人才，但為何未接納實務界人士的建議，部分可能和當時台大仍具相當自主性，未必為教育部所能掌控有關（林麗雲，2004；黃庭康，2016）。對於重視和抓緊宣傳事務的國府來說，不願將關乎培養宣傳人才的機制設置在台大，但實務界此時的這些舉措可能對國民黨產生一些壓力，必須加快在其他大學設立新聞傳播科系。

面對內外不穩定情勢，國府更急迫建立一套道德論述，以穩定統治的基礎。此論述隱含特定的世界觀與邏輯，即邪惡的共產主義威脅與破壞自由世界，而國府代表自由與正義，繼承中華文化的道統，正與世界上自由民主的國家合作，對抗邪惡的勢力，致力於反共戰爭。因此，必須更加強化宣傳，說服國內外人士相信其道德論述。在國際宣傳方面，必須爭取美國的信任，在其背書下才能宣稱自己代表中國，並能打贏反共的戰爭。在國內的宣傳方面，則必須把文化道德論述灌輸在民眾腦海，以說服他們相信國府的統治。在國府威權統治下，以黨政力量介入與動員傳播媒體、教育與學術等重要論述工具，特別是成立新聞傳播教育與學術機構（林麗雲，2004，頁 70-77），因此除角色較為受限政工幹校，需要有其他教育機構來擔負此任務。1953 年 7 月韓戰停歇，但亞洲其他地區的情勢仍緊繃，美國強化文化冷戰的攻勢，也投下更多資源加強台灣反共人員的宣傳能力和訓練，使得國府更具條件開展新聞與傳播教育。

國民政府遷台後，曾有原則上在中國大陸的公立大學，在台一律不考慮復校的決議（國立政治大學 a，n.d.）。但是在島內外的情勢變化與壓力下，加上取得不同美援項目的支持，國民黨政府值此時機推動兩策略，即提升臺灣既有高校的同時，強化國家建設上最需要的教育與工業領域的同時，也在政權需要人才鞏固權力的思考下，推動國立政治大學在台復校。

1954 年 6 月 9 日教育部長的張其昀在呈函行政院復辦政治大學；7 月 3 日蔣中正核派張其昀蔣經國陶希聖等十人為復校籌備委員，決定先設研究部（國立政治大學 b，n.d.）；12 月 2 日，政大研究部正式開課，是國民黨政權在台復校的第一所正規大學。從正式提請復辦到研究所開課，教育部僅用半年即執行完成，效率極高；1955 年 4 月蔣中正親自任命原代理校長陳大齊，正式成為政大復校後首任校長。因此，政大的快速復校涉及最高權力者的意志和其政治需求的考量。

1954 年政大復辦後，首先開設新聞研究所等四個研究所（其他包括行政、公民教育及國際關係，後改為政治、教育與外交）。1955 年大學部新設的新聞、教育、政治、外交及邊政學系，這些研究所與科系的設置，明顯皆與政權的治理需求和維繫，以及文化宣傳有關。1955 年政大首屆大學部招生名額：本地生 100 名；「僑生」160 名，可能也是為了討好美國，以爭取美國在日後提供更多援款（黃庭康，2016，頁 107）。

做為中央政治學校（前身為中央黨務學校）和中央幹部學校的合併產物，國立政治大學一直是國民黨政權的人力培育搖籃。政大是政府高級官員的培養場所，美國很清楚它的利益必須透過台灣的菁英來落實，因此華盛頓透過不同管道對政大的外交、大眾傳播及 MBA 計畫給與合作支持。政大是美國反共策略的其中一個重要環節，美國在扶植有助經濟發展的技術官僚的同時，並沒有忽視有關政治、管理、以及影響意識形態的人文學科（黃金麟，2017）。

除了美援，美國還透過傅爾布萊特法案（Fulbright Act）和史墨法案（Smith-Mundt Act）的經費在台灣進行文化外交活動。1956 年美國駐中華民國的官員認為，當時以史墨法案經費到台灣授課的三位美國教授，有很好的機會影響台灣的大學師生，特別是他們在政治大學客座教授的職位，更具有影響力，因為政大是訓練台灣外交和新聞傳播人才的重鎮（趙綺娜，2001，頁 102-103）。

在美援撥付給台灣各大學的經費中，台大、政大、師大與成大約占了八成（國立教育資料館編，七年來的中美教育合作，1959:61）。美援結束後，美援會對台大、師大與成大的美援效果都進行成果檢討報告（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編，1964a；1964b；1964c），當中都相當清楚臚列各種經費，獨缺政大的成果檢討報告，或可顯示政大的特殊性質和角色。

肆、新聞傳播研究機制的奠定

1935 年國民黨中常會決議在政大前身的中央政治學校設立新聞系，校長蔣介石認為「新聞事業與革命建國關係密切，新聞人才之培養尤為健全的新聞事業之根本」（馬星野、王洪鈞，1967）。除了因應國內各地需要的新聞人才，政大新聞系的另一特色是為培養國際選傳遞人才，在 1942 年的抗戰階段，政大與中央宣傳部合辦新聞學院，並延聘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主持教學工作，這是政大新聞研究所的前身。因此，政大新聞系在基本使命，以及在教育內容和形式上，與一般學校不盡相同（徐佳士，1982，頁 90-92）。

在 1954 年開辦新聞研究所前夕，爆發首次台海危機；1958 年再爆發二次台海危機，在當時台灣的戰爭狀態下，新聞管制是戰時施政的重要工作，且取得以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之名下的正當性，黨政軍宣傳部門也強化更有效的新聞與宣傳機制（林果顯，2015），逐漸加強介入媒體的種種措施。黨政在新聞媒體逐漸建立嚴密的內控機制，無論在言論的守門機制，或是對於新聞從業人員的偵防機制，且透過「政治獵巫」行動，在反共之名下，透過政治案件掃除異己，不少新聞工作者也涉及政治案件（陳百齡，2019）。因此，1950 年代台灣的新聞環境可說是籠罩在總動員作戰的

氛圍中，此時新聞傳播系所的建立，更有國府面對戰爭的急迫現實需要，影響了此時新聞傳播研究與教育的建制化。

在培養新聞傳播人才部分，國民黨政府也構建控制機制，透過統治者所信任的宣傳官僚在台灣建立傳播研究與教育機制。政大新聞研究所成立的目的，是為了「配合國策及培養高級通才」（謝然之，1963），培養理論與實務並重的高級新聞人才，面對此時仍然緊繃的戰爭狀態。1954年時任教育部長的張其昀在政大演講時表示，「新聞研究所應致力於宣傳事業」（胡春惠，1989，頁224）。

在1950年代以蔣介石為首的宣傳體系中，蔣積極關心和介入宣傳事務，而曾虛白是宣傳體系的一員，曾協助蔣介石進行情報蒐集與調查工作（林果顯，2014）。在蔣介石的核心幕僚陶希聖因黨內派系矛盾拒任新聞研究所長後⁸，由當時任中央社社長的曾虛白擔任首任新聞研究所長，前後擔任此職務達15年（1954-1969）。曾虛白在1943年曾任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學院副院長，到台灣時曾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在擔任黨營中國廣播公司副總經理時曾短暫身兼國民黨第四組主任，以及擔任中央通訊社社長等職務，可謂是1950年代初期宣傳官僚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政大新聞系則在1955年復辦時由曾虛白兼系主任，但因分身乏術，隔年交由同樣具濃厚黨政背景的《台灣新生報》社長謝然之接主任一職（1956-1960），開展政大新聞所系的建制化。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掌握新聞傳播學術生產主導權的曾虛白，與謝然之皆以在政治與文化場域所累積的資本，使其能穿梭在政治教育與學術之間，且將政治場域的邏輯轉移至教育與學術生產場域，且以學術的語言加以詮釋和傳遞（林麗雲，2004；楊秀菁，2012，頁20-21）。

此時台灣新聞傳播教育與研究的基調，基本上是由戰後遷台的中國學者所建立，除了當時黨政脈絡下以國家之名的需求，美國的新聞傳播教育體系，尤其是「密蘇里模式」，從民國建立後就一直在中華民國扮演關鍵角色（楊秀菁，2012；張詠、李金銓，2008）。

1935年蔣介石任命剛從密蘇里返國的馬星野，在中央政治學校創立新聞系，運用密蘇里的課程培養大批黨報記者和宣傳人員（張詠、李金銓，2008）。在台復校後的新聞系主任謝然之和接替其職務者王洪鈞（1960-1967）皆從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取得碩士學位；新聞研究所所長曾虛白雖未曾接受過正規的新聞教育，但其新聞專業累積過程與美國經驗息息相關。曾虛白跟隨董顯光進入新聞界，而董顯光曾在密蘇里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就讀，返中國後在1925年開辦《庸報》，且引進倒金字塔新聞寫作模式，且將傳統的中文豎排版面改成橫排，曾虛白也加入《庸報》（張詠、李

⁸陶希聖本是蔣中正的文膽，是當時黨政宣傳核心機制負責人，政大復校的籌備委員中，陶希聖是其一。但是陶希聖是從總統府祕書長張群處得知，教育部簽呈總統由陶擔任新聞所所長。陶不贊同另一個研究所的人事是由立委崔書琴接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經表達未獲回應後，拒絕任命（陶晉生，2014），才改由曾虛白接任。其中涉及陶希聖與時任教育部長張其昀的矛盾。

金銓，2008，頁 329）。抗戰時董顯光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曾虛白擔任國際宣傳處長。1943 年中宣部為培養國際宣傳人才，與哥倫比亞大學合作，在中央政治學校設立新聞學院，董顯光但任院長、曾虛白為副院長。此新聞學院共辦了兩年，政大新聞系主任王洪鈞畢業於此研究院，而遷台後成立的政大新聞研究所，可以說是繼續了戰時的新聞研究院（董顯光，1967）。

「密蘇里模式」在理念上非常強調規範性的新聞自由新聞責任和新聞道德，說明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不作艱深抽象的哲學或學理探討（張詠、李金銓，2008）。謝然之在 1955 年發表的〈新聞學的發展與新聞學教育之改革〉，基本是以美國的新聞學教育與研究的發展為基礎和想像（謝然之，1955，頁 10-17）。政大新聞系復辦時，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學生在兩周內募集兩百多本參考書捐贈給新聞系（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編，1959），可見兩校間的長期聯繫與傳承，也顯現在對新聞工作的理念基礎，但加入當時的國家氛圍與需要，背後主要還是要貫徹蔣介石的意志。

除了「密蘇里模式」理念，曾虛白對於新聞工作理念的基礎，來自孫文提出的「三覺論」，其中指「先知先覺」者為少數天才，「後知後覺」者受先知先覺啟發後，向大部分「不知不覺」者進行鼓吹。而曾虛白對於新聞工作者的定位為後知後覺者，且應為先知先覺者服務，其任務是溝通政府與民眾，反對營利考量，主張社會責任，且要求媒體自律，而不是質疑批判（林果顯，2014，頁 143-146）。

新聞研究所在建立學術研究基礎過程中，也運用美國的各種資源，曾虛白即透過美國新聞處動用美方專設援外的「傅爾布萊特基金」資助，從 1955 年起每兩年邀請一位美日學者到政大任客座教授，前後陸續有八位學者在政大講學開課⁹（曾虛白，1990，頁 725-729），部分學者的專長有助於建構心戰策略（程宗明，1999，頁 102-103）。曾虛白也逐漸建立其對於「民意」的理論基礎，聯繫上其三民主義中的「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的論調，認為在政府與人民間應建立溝通管道，由先知先覺的領導，帶領不知不覺的群眾，創造正確的民意，而新聞工作者除了是位於中間發揮輔導作用者。曾虛白認此說法可在中國本土脈絡下，補充美國民主體制與學術對此問題的不足（曾虛白，1990，頁 729-737）。

在曾虛白主導下，在當時戰時氛圍中，從美方取得資源建構為在亞洲的心戰重地，根據國家的需要，以反共和國家安定為主軸，運用「三覺論」的論述基調，建構新聞工作與宣傳的位置。1961 年政大新聞館落成時，獲得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來電致賀，電文提及「貴校在蔣總統創設擊劃下，宏規早立，更因其在非共產世界推廣新聞教育居於領導地位而譽滿遠東……」（馬星野、王洪鈞，1967，頁 69），規格相當不同，也可見其特殊性和在美國文化冷戰中的重要性。

⁹ 1962 年，曾虛白也獲美國亞洲基金會贊助，開始進行《中國新聞史》一書的撰寫計畫，建構以「中國」為想像的新聞史，也確立中華民國的正當性（曾虛白，1990，頁 738-743）。

從新聞研究所初創的七屆（1954-1960）來看，總計 67 名學生，來自不同省籍，其中以江蘇和浙江居多，約占三分之一，當中僅一名外籍生，未顯示有「僑生」；學生的本科學科背景主要來自新聞系、經濟系與外文系（中華民國新聞年鑑編纂委員會編，1961，頁 9）。

但這個新聞傳播建置未必是鐵板一塊，完全沒有縫隙，譬如邀清美國與日本學者來臺講學，就未必能完全掌控其言論，就有學者以二戰期間從美國邀請的新聞工作者為例，指出美國在二次大戰時曾通過援華計畫幫助中華民國強化新聞專業，當時被派到中國的美國新聞專業人士都驚覺中國政府只把媒體當成是黨的喉舌，國民黨一直踐踏新聞自由，完全不尊重新聞工作者的專業自主權，有些最後和國民政府不歡而散，因此質疑在 1950 年代政大「黨校」色彩甚濃之下，這些美國學者是否能和系方合作愉快（黃庭康，2017，頁 174）。

政大透過在大學部招收大量僑生，在復校初始階段獲取更多資源建設學校與系所，在這樣的基礎上，也讓研究得以更好的開展，且在整體研究與教育的分工上，這批受學術訓練能掌握更多理論的各省籍學生，日後可以成為國府直接可任用的宣傳與建構新聞論述人員，被賦予更高階的工作任務。持續建立國家安全為基礎的整體理論，強化和宣揚國府政權在海內外的正當性。

表：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研究生籍貫統計（1954-1960）

籍貫	江蘇	浙江	湖南	福建	山東	臺灣	江西	安徽	遼寧	湖北	河北	山西	廣西	廣東	河南	青島	北平	韓國	共計
人數	13	9	7	7	5	4	3	3	3	2	2	2	2	1	1	1	1	1	67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新聞年鑑編纂委員會編（1961:9）

伍、冷戰初期新聞系的任務與特點

冷戰初期台灣正值國家生死存亡之間，在新聞傳播的研究與教育建制化過程中，部分奠基於反共復國與國家安全的論述，而大量「僑生」的存在，能強化「自由中國」的論調和中華民國是「中國」的正當性，且可從中取得美援，有助於整體大學機制的開展，更實際的將宣傳機制向台灣以外地區延伸，與其他地方合作對抗共產力量的擴張。

一、復辦後新聞系的任務

新聞系復辦後，延續過往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的傳統，且有大批海外青年學生到「祖國」接受新聞教育，擴大「自由世界」到各地的宣傳種子，且能獲美援補助。因政大的特殊角色，使新聞系在臺復辦後，在學生人數、制度、課程和設備上，都肩負建設臺灣復國建國需要的新使命（徐佳士，1982，頁 93）。

「我們的教育目標是培養真誠純潔的青年，成為大公無私盡忠職守的記者。我們以追求真理與事實來建立公正的輿論，為服務社會而不斷努力，我們信仰三民主義，忠愛國家民族，並以促進自由世界的團結與瞭解為我們奮鬥的目標（謝然之，1959）。」

擔任新聞系系主任的謝然之，從他的黨政關係來看，其從 1937 年起後，便在陳誠麾下負責文宣工作，陳誠更為其證婚人，可說是陳誠人馬。而陳誠在擔任台灣省主席後，在 1949 年任命其擔任《台灣新生報》社長¹⁰（至 1970 年），等同是將該報交由其親信手中，使其成為省府最重要的宣傳機關。然而，透過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參與，謝然之也接觸了蔣經國，並在 1943 年與其首次會晤時談及創辦中央青年幹校的問題。1950 年，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指示其成立政工幹校新聞組（謝然之，2000，頁 161、165）。在謝然之結束新聞系主任職務後，曾任國民黨中央第四組主任（1961-67），顯見國民黨多位領導人對其的信任程度。

但謝然之在接下新聞系主任時，因無力兼顧系務，聘請新聞研究所畢業的李瞻、陳諤和張宗棟任講師，協助日常教務和學生實習刊物（謝然之，2000，頁 168）。1957 年再聘任自美返台的王洪鈞任教和協助系務；1960 年謝然之辭系主任，由王洪鈞接任。在新聞系草創時期，謝然之未必有很大心力涉入，但透過其可信任的學生輩協助系務，謝然之看起來較像是監督者的角色，且謝在 1960 年代也是國民黨傳媒「社會責任論」的主要推動者（楊秀菁，2014），強調國家利益高於新聞自由等理念。

在新聞系的教學上以「密蘇里模式」為實作基礎；在出版物部分，1958 年創辦校內發行的英文刊物《政治前鋒》（The Cheng Vanguard），由台北美國新聞處贊助（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編，1959），創刊時期也由台北美國新聞處官員指導和協助，且也運用美新處資源上課和執行編務（李敦嶠，2004，頁 5,22）。

1960 年政大新聞系也和管制媒體的國民黨第四組合作進行研究工作，主要是選擇比較各報紙在重大新聞中的作風，以及剖析其可能的影響，相關研究成果多由國民黨第四組出版，再分送各界參考（馬星野、王洪鈞，1967，頁 71）。這些作為可以看到國民黨透過和學術機制的合作，試圖以學術研究作為媒體的實務規範，也與其所強調的社會責任論有所結合。新聞系強調「大量新聞教育」，為推翻中共政權後國家重建準備足夠的人才，且力行三民主義，其中，包括人數眾多的「僑生」，因此，新

¹⁰在謝然之任《台灣新生報》社長期間，其在大陸時期的政大新聞系與台灣政大復辦後的多名學生，成為《台灣新生報》的中堅幹部；謝然之也身兼台北政工幹校新聞組主任，1950 年代《台灣新生報》也成為該校實習的報社之一，許多學生畢業後先後進入該報任職（楊秀菁，2016，頁 64）。

聞系在教育工作上，有「大量教育」和「僑生」教育兩大目標（馬星野、王洪鈞，1967）。

因此，在大學部的部分，其思考和研究所不太一樣，也有不一樣的分工，更著重實務人才的培養，其中「僑生」人數約占一半，也將「中國」的定義擴大，含括了地區的「華僑」，特別是美國所重視的東南亞地區，持續對台灣內部與外部建構建國與復國論述。在中央政校時期，新聞系教育的一項特色是培養國際宣傳人才，在台復系後，透過來自海外其他地區的大量「僑生」，更擴大在國際的宣傳工作，「為復國建國而努力」（馬星野、王洪鈞，1967，頁 62）。

表：政治大學新聞系註冊人數與「僑生」人數（1955-1960）

年份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註冊總數	45	60	75	47	73	99
僑生人數	24	21	36	25	40	68

資料來源：馮建三編（2005:356）

但是對於招收眾多「僑生」，也引發實務界的不同意見。在 1961 年 5 月由政大召開的教育座談中，中央社前社長蕭同茲認為新聞教育要有完整的體制和一套完整的課程。他甚至不主張因為政策性的需要，或爭取美援而接受來自各地「僑生」，因學生語言和水準有落差，影響了新聞教育的素質。而編輯人協會也建議政大新聞系學生人數必須加以限制。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長姚淇清不表贊同，強調「吸引『僑生』是國家的政策」（王洪鈞，1993，頁 168-169）。實務界的這類意見在官僚舉起「國家」之名下，難以改變和鬆動政府的決策，也讓系務堆展面臨兩難情境。

來自各地、人數眾多的「僑生」，在學習上會面對各種問題，譬如中、英程度不一，大學校方也了解其中的教學等問題（馬星野、王洪鈞，1967，頁 67；王洪鈞，1993），但在國家的大方向下，僅能在自身有限的的能力範圍下進行調整。而政大新聞系中大量「僑生」的存在，似也在展示「國家」的特殊位置與「反共復國」的任務仍在持續，也使「密蘇里模式」學理受到限制。

二、師大與私立大專新聞傳播教育的角色

1955 年政大恢復新聞系大學部，師大也開設社教系，從第二學年開始實行分組，有新聞組、圖書館組和社會事業組。其中新聞組的角色和政大新聞系做了一些分工，復校後政大新聞系與師大社教系新聞組同年同月誕生，而任課老師也是兩校互通。社教系新聞組是「訓練社教專才，以大眾傳播為社教的媒介，達成改造社會的任務」，

不過學生人數不多，至 1961 年的三屆畢業生共 45 人（中華民國新聞年鑑編纂委員會編，1961，頁 32）。

1955 年 9 月，為拉攏與聯繫海外華人，僑委會在台北召開「華僑文教會議」中，提出「發展華僑社會教育方案」，要求在新聞人材缺乏的地區，建議政府設置獎學金，鼓勵該區「僑生」修習新聞學系，同時建議政大開辦新聞學專修班，招收有志從事新聞事業的華僑青年，透過一年或兩年的訓練及實習後，居住地擔任新聞工作（鄭彥棻，1955，頁 84-85）。同時，台灣的民間也有言論呼籲政府和新聞業協助各地華文報紙，對抗中共的積極進逼（元建，1955，頁 80-82）。

與中共競爭積極爭取外在華人社會支持的國府，面對他們實際的需求，必須予以回應，也希望能擴大在海外的宣傳成校，而師大成為緩衝的機制，減少對政大的干擾，可能經內部協商，1956 年 8 月改在師大增設華僑新聞教育專修班。1956 年 10 月開辦華僑新聞專修班，由海外個僑報保送新聞人員回國深造（鄭彥棻，1957，頁 23）。學員在師範大學研究社會學和新聞學，且有旅行參觀行程，更了解台灣的社會和經濟狀況，被期待一年後返鄉能更多正面宣傳自由中國的進步。

華僑新聞專修班首屆收生人數為 40 名（國史館藏，n.d.），1957 年和 1958 年分別收生 16 人與 13 人，學生主要來自東南亞的越南和星馬（彭震球，1958，頁 54）。至 1959 年參加新聞記者訓練班者共有三十九人（國立教育資料館編，1959:60；師大，1958，頁 171），效果不是很好，後來也就無以為繼。

在私立高等教育部分，「世界新聞職業學校」¹¹則在 1956 年獲准興辦，屬職校層級，歷經 1960 年的「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和 1991 年的「世界新聞傳播學院」，1997 升格為綜合型大學（世新的前身是成舍我於 1944 年在北京創辦的「北平新聞專科學校」）。時任立法委員的成舍我在 1952 年本想在台復辦《世界日報》，但因國府實施戒嚴與「報禁」，未能獲准。1953 年 4 月 18 日他在《新生報》發表「需要一萬名新聞幹部回大陸」，強調培養新聞人才的重要，結果獲准辦校。成舍我原想辦轉科或本科，但因當時政府對大專設立管制嚴格，只能先辦職業學校（成嘉玲，1998）。顯見國府對大專的限制及對新聞教育的謹慎，但也要安撫內部的壓力，攏絡民間人士。

成舍我在呈請立案的創校旨趣中指出：「本校創立，其目的在培養『德志兼修，手腦並用』之健全新聞人才，供自由中國及反攻大陸後，建立新聞自由及健全新聞事業之用」（成舍我，1976，頁 13）。因此，國府雖對民間辦校嚴格管制，但在共享「自由中國」與反共的共識上，讓有一定聲望的成舍我創立職業學校。

1962 年張其昀創辦中國文化學院（中國文化大學前身），隔年成立新聞系，邀請謝然之擔任系主任，但謝然之仍任《台灣新生報》社長，乃商請政大新研所畢業的鄭貞銘代理系務（謝然之，2000：，頁 71）。

¹¹ 成舍我在訪問密蘇里新聞學院的三年後，在 1933 年於北京成立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冷戰初期在國府的「反攻復國」口號與管制下，各個新聞傳播教育科系也在以政大新聞系設置的框架下展開。1965年教育部修訂個學系必修科目，在新聞系部分即以政大課程修訂案為藍本（王洪鈞，1993，頁188）。

因此，整體而言，在冷戰初期連動的季風亞洲地緣政治脈絡中，台灣的新聞傳播學術與教育得以逐漸建制化，而新聞傳播學術的掌舵者以國家的首要目標（在國府領導下從事反攻復國）為基礎，建立規範性的新聞理論與大敘事歷史。當國府要出手管制媒體時，傳播學術生產場域的成員就協助擘畫新聞管制政策，且把官方新聞管制的邏輯翻譯成學術語言，建構規範性的新聞學理論，以正當化國府的新聞管制，強調媒體有社會責任引導「正確的」民意（林麗雲，2004，頁80-94）。來自其他地域的大量華裔學生在接受相關教育後也受到影響，返回居住地後各自發揮自身所學，持續進行著未必被看見的工作，也在過往台灣新聞傳播研究與教育機制的建構敘事中多被隱身忽視。

陸、小結

冷戰初期美國更全面介入季風亞洲，但不斷調整其策略，以更有效抑制共產力量的擴散。在戰時狀態下，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和美國的互動，雖有政治現實考量來鞏固政權，但也不是完全順從的角色。國府順應時勢變化爭取美國的支持和實質的資源，爭取扮演「自由世界」在季風亞洲的角色，也藉此機會開展在台灣的建設和鞏固政權。其間涉及的不僅是美國政府、在台國民黨政府與中國大陸的中共政府，還有冷戰初期東南亞等地的政經情勢變化，產生連動關係。

1954年後蔣介石因應內外的各種壓力，在季風亞洲地緣政治中順勢接收更多美援，在台灣強化大學教育建設和建立在台灣的宣傳機制，以建設台灣和鞏固政權。此時國府透過招收大量東南亞「僑生」，增強對大學體制的控制力，也以此強化其內外的「自由中國」正當性，以及培養在各地宣揚自由民主意識，對抗中共在華人地區的號召力。前身為黨校的政大在台復辦與其新聞系招收近半的「僑生」，成為當時相當特殊大學與科系，而台灣新聞傳播研究與教育以政大新聞所系為重心的開展，除了蔣介石與國府的治理需求，當中也考量美國與亞洲非共國家的反共策略與佈局，也涉及各國對在地華人的政策回應和治理。

政大新聞系復辦後的主要主事者與黨政關係緊密，且在形式上以「密蘇里模式」為主的新聞理念為基礎，但還是須符合國家安全與「反共復國」的特殊現實需求，難以挑戰以「國家」之名舞動權力的領導人權威。但是在「國家」內部的利益分配等因素，連動影響政策的推動，且仍有被壓制的些許異議聲音。國民黨政權重整宣傳指揮

體系和取得更多美援下，在季風亞洲試圖建立「自由世界」之窗的形象，在相當程度上形塑冷戰初期的台灣傳播研究與教育機制初步基礎。

參考文獻

- 中華民國新聞年鑑編纂委員會編（1961）。《中華民國新聞年鑑》。台北：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
- 王洪鈞（1993）。《我篤信新聞教育》。台北：正中。
- 元建（1955）。〈現階段的華僑報業〉，《報學》，8：80-82。
-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編（1966）。《僑生教育計畫運用美援成果檢討》。台北：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 成舍我（1976）。〈我如何創辦世新〉。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編印，《世新二十年》。台北：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 成嘉玲（1998）。〈「世新」永遠的老校長：父親在新聞教育上的理念與貢獻〉，中國人民大學港澳臺新聞研究所編，《報海生涯：成舍我百言誕辰紀念文集》。北京：新華。頁 164-173。
- 台北市編輯人協會第四屆理監事會（1956）。〈會務報告〉，《報學》，1（4）：156-157。
- 李敦嶠（2004）。《征戰時運有迷悟：首位砂勞越留臺生半世紀沐恩旅程》。吉隆坡：自行出版。
- 利亮時（2012）。《陳六使與南洋大學》。新加坡：八方。
- 林孝庭（2015）。《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88》。台北：聯經。
- 林孝庭著、黃中憲譯（2017）。《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台北：遠足文化。
- 林果顯（2014）。〈來臺後曾虛白的宣傳工作與理念（1949-1994）〉。《國史館刊》，39：117-157。
- 林果顯（2015）。〈戰爭思惟下的戰後臺灣新聞管制政策（1949-1960）〉。《輔仁歷史學報》，35：239-283。
- 林麗雲（2004）。《台灣傳播研究史：學院內的傳播學知識生產》。台北：巨流。

- 《美援有關教育計畫實施報告》（1957）。台北：國立教育資料館。
- 省立師範大學（1958）。《師大概況》。台北：省立師範大學。
- 馬星野、王洪鈞（1967）。〈本校新聞教育的回顧與前瞻〉。《政大四十年》。台北：國立政治大學，頁 61-74。
- 胡春惠（1989）。〈第七章 在台復校初期（1954-1959）〉。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稿》。台北：國立政治大學。
- 國立政治大學（n.d.）。〈歷史沿革〉。《政大校史網》，上網日期：2021年12月13日，取自 <http://archive.rdw.lib.nccu.edu.tw/history/>
- 國立政治大學（n.d.）。〈民國 41-60 大事記〉。《政大校史網》，上網日期：2021年12月13日，取自 <http://archive.rdw.lib.nccu.edu.tw/1952to1971/>
- 徐佳士（1982）。〈政大新聞教育的創始成長和現狀〉，《新聞教育與我》。台北：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頁 87-99。
- 程宗明（1999）。〈析論台灣傳播學研究/實務的生產（1949-1980）與未來：從政治經濟學取向思考對比典範的轉向〉，林靜伶編，《1998 中華傳播學會論文選集》，頁 385-439。
- 麥留芳（1985）。《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陶晉生（2014）。《陶希聖日記（下）1947-1956》。台北：聯經。
- 馮建三編（2005）。《自反縮不縮？新聞系七十年》。台北：國立政治大學。
- 曾虛白（1990）。《曾虛白自傳》。台北：聯經。
- 張其昀（1958）。〈最近四年之華僑教育〉，《教育文化》，第 173 期，頁 18。
- 張詠、李金銓（2008）。〈密蘇里新聞教育在現代中國的移植：兼論帝國使命、美國實用主義與中國現代化〉，李金銓編著，《文人論政：民國知識分子與報刊》，台北：政大出版社，頁 321-350。
- 陳百齡（2019）。〈報業政治獵巫：1950-80 年代《台灣新生報》政治案件〉，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特藏管理組編，《未完結的戰爭：戰後東亞人權問題》，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頁 51-101。
- 貴志俊彥、土屋由香著，林鴻亦譯（2012）。〈文化冷戰期美國的公關宣傳活動及其對亞洲的影響〉，貴志俊彥、土屋由香、林鴻亦編著，《美國在亞洲的文化冷戰》，台北：稻鄉，頁 3-24。
- 彭震球（1958）。〈我們的新聞教育專修科〉，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僑生輔導委員會編，《僑生之友》，台北：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僑生輔導委員會，頁 53-54。
-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編（1959）。《政治大學的新聞教育》。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

- 國立教育資料館編（1957）。《美援有關教育計畫實施報告 1953-1957》。台北：國立教育資料館。
- 國立教育資料館編（1959）。《七年來的中美教育合作》。台北：國立教育資料館。
- 國史館藏（n.d.）。〈僑生回國升學三〉，外交部，數位典藏號:020-049910-0063。台北：國史館。
- 楊秀菁（2012）。〈新聞自由論述在台灣（1945-1987）〉。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 楊秀菁（2014）。〈戒嚴時期傳媒「社會責任論」的引進與演變〉。《思與言》，52（2）：241-297。
- 楊秀菁（2016）。〈戰後初期《台灣新生報》的發展與挑戰（1945-1972）〉。《傳播研究與實踐》，6（2）：55-85。
- 黃金麟（2017）。〈戰爭與台灣的高等教育，1945-1990〉。《台灣社會學》，34：123-167。
- 黃庭康（2016）。〈反思台灣威權時期僑生政策的形成〉，蕭阿勤、汪宏倫編，《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頁 83-116。
- 黃庭康（2017）。評〈戰爭與台灣的高等教育，1945-1990〉。《台灣社會學》，34：169-175。
- 董顯光（1967）。〈憶本校戰時的新聞研究院〉。《政大四十年》。台北：國立政治大學，頁 54-57。
- 謝然之（1955）。〈新聞學的發展與新聞學教育之改革〉，《報學》，8：10-17。
- 謝然之（1959）。〈前言〉，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編，《政治大學的新聞教育》。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
- 謝然之（2000）。〈自述年譜簡編〉，謝然之教授九秩華誕祝壽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新聞與教育生涯：謝然之教授九秩華誕祝壽文集》，頁 151-193。臺北，臺灣：東大。
- 趙綺娜（1995）。〈美國對東南亞華人的政策，1953-1957〉，「第二屆冷戰時期之美國」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995年3月11日。
- 趙綺娜（1997）。〈冷戰與難民援助：美國「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歐美研究》，頁 59-108。
- 趙綺娜（2001）。〈美國政府在台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1951至1970）〉，《歐美研究》，頁 79-127。
- 鄭彥棻（1955）。《華僑文教工作的方針與任務》。台北：海外。
- 鄭彥棻（1957）。《當前僑務：講述綱要》。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組（未出版）。

鄭彥棻（1972）。《往事憶述》。台北：傳記文學。

Kuhn, P. A. (2008) .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Singapore:NUS Press.

